

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

列寧著

關於紀念日



『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
農民革命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列寧著

關於紀念日



『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
農民革命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一九五五年。莫斯科

出 版 局 聲 明

本版列寧著關於紀念日。『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一書，係按蘇共中央附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院所編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原文譯出。

目次

關於紀念日	5
『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	16
簡要註釋	29

關於紀念日

所謂農民改革的五十周年，引起了很多有趣的問題。我們在這裏只能談談其中某些經濟問題和歷史問題，那些較狹義的政論性的論題，我們把它們留在另外的場合去談。

十年至十五年前，當民粹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初次公諸於廣大民衆之前時，對於所謂農民改革評價中的意見分歧，屢次成爲這種爭論中的主要問題之一。民粹主義的理論家們——如有名的瓦·沃先生或尼古拉一昂¹⁾——認爲一八六一年農民改革的原理，是在原則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並與其在原則上相敵對的。他們說，二月十九日的法令，使『生產資料分配給生產者』具有了法律上的根據，法定了不同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人民生產』。說在二月十九日的法令中已可以看到俄國非資本主義進化的保證。

馬克思主義者當時就已把在原則上是另一種的觀點，和這種理論對立起來了。二月十九日的法令，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農奴制度的（或封建制度的）

生產方式的插曲之一。從這個觀點來看，法令中沒有任何別的歷史的經濟成份。『生產資料分配給生產者』只是句引人動聽的空話，它掩蓋了農業小生產者的農民已從以自給經濟為主的生產者轉變為商品生產者的這一簡單事實。至於說那一時代的俄國各地區農民經濟中的商品生產在這轉變時發展得如何強烈或如何薄弱，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毫無疑義，一個『被解放了的』農民所進入的正是商品生產的局面，而決不是別的生产局面。所以，代替*農奴勞動的『自由勞動』，只是在商品生產條件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下的僱傭工人或獨立的小生產者的自由勞動。贖金更加明顯地表示出了改革的這種性質，因為贖金推動了貨幣經濟，即加強了農民對市場的依賴。

民粹主義者認為農民分得土地的解放，是非資本主義的原則，是他們稱之為『人民生產』的『始基』。他們認為，農民沒有分得土地的解放是資本主義的原則。民粹主義者（特別是尼古拉一昂先生）把馬克思的學說拿來作為這種觀點的根據，引證了勞動者脫離生產資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這一點。特殊的現象是，馬克思主義從八十年代起（也許還要早些）就已是西歐先進社會學說中如此無可爭辯的實際的統治力量，以致在俄國，那些敵對馬克思主

* 因為這種代替是真的實現了的，所以我們在下面就可看到，這種代替進行得遠比最初所表現的要複雜得多。

義的理論，也不能長期地公開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這些理論詭辯和捏造了馬克思主義（往往是無意識的），這些理論好像是自己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並且是『依照馬克思』來力圖推翻馬克思理論在俄國的應用！尼古拉一昂先生的民粹主義的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的』稱號自居（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而後來，司徒盧威先生和杜干一巴蘭諾夫斯基先生之流的自由資產階級理論，是從『幾乎』完全承認馬克思開始的，他們這樣來發展自己的觀點，並在『進一步批判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外殼掩飾下來推行自己的自由主義。我們對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直到現代機會主義，即為掩飾反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名詞不放的取消主義為止的）俄國社會理論發展的這一特徵，顯然就不得不要再三地提到。

在目前民粹主義對『偉大改革』的估價，很使我們感到興趣。認為一八六一年剝奪農民土地的意圖，是資本主義的意圖，而把土地分給農民的意圖，則是與資本主義相反的社會主義的意圖的這種觀點，根本是錯誤的（民粹派中的優秀人物把『人民生產』這個名詞看成是由於書報檢查的阻礙而被迫採用的社會主義的別名）。這種觀點是極端違反歷史的，是要把馬克思的『現成』的公式（這種『公式』只能用在高度發展的商品生產上）轉移到農奴制度的基地上去。實際上，一八六一年農民土地的被剝奪，在多數場合中所造成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自由工人，而是同一個『老爺的』即

地主的土地上被奴役的（就是說，實際上是半農奴式的，或甚至幾乎是農奴式的）佃農。實際上，一八六一年的『份地』，在多數場合中造成的不是自由的獨立農民，而是把被奴役的佃農束縛在土地上，他們由於使用牧場、驅畜場和草地，使用必要的耕地等等，事實上就不得不以用自己的工具去替地主耕作土地的形式還是從事勞役。

農民如果是實際上的，而不只是名義上的從農奴制度的關係中解放了出來（這種關係的實質是『工役租』，即分得土地的農民，要為地主勞作），那他也就處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之中。但是，這種從農奴制度的關係中獲得真正的解放，比民粹派分子所想像的要複雜的多。剝奪土地的擁護者和『分地』的擁護者間的鬥爭，當時往往只是表現農奴制度中的兩個陣營的鬥爭，只是關於地主所有的佃農（或『工役』農民）是完全沒有土地對地主更加有利呢，還是『有份地』，即被固定在一個地方，被束縛在一小塊土地上（這小塊土地上不能維持生活，而必需尋求『生路』，去給地主奴役）對地主更加有利呢的爭論。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毫無疑問，農民在解放時獲得的土地越多，他們獲得的土地越便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越快，越廣，越自由無束，農奴制度和奴役關係的殘餘消失得也就越迅速，國內市場也就會越加廣大，城市，工業和貿易的發展也就越有保障。

民粹派分子的錯誤，就在於他們以幻想，抽象和離開具體歷史情況的態度來看待問題。他們把『份地』解釋為獨立小農業的基地：如果這是正確的，那末『分得土地的』農民也就變成了商品生產者，陷身於資產階級的條件之下。事實上，『份地』往往是如此的小，如此的困於過多的支付，被劃分得如此不利於農民，而『利於』地主，以致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無止境的奴役地位，事實上仍然是處身於農奴制度的關係中，還是從事於勞役（工役租等形式的勞役）。

因此，民粹主義中間就隱藏了兩重傾向，馬克思主義者在說及自由民粹主義的觀點和自由民粹主義的估價等等時，就已說明了這兩重傾向的特徵。民粹派分子既然粉飾了一八六一年的改革，忘記了『分地』在多數場合實際上就是以廉價的束縛在一個地方的人工，廉價的奴役勞動來保證地主經濟，因而他們就降低到（往往不意識到這點）自由主義的觀點，自由資產者的觀點，或甚至可說降低到自由地主的觀點；——因而他們在客觀上就成了被地主的傳統慣例拖累最甚，和農奴制度的舊的一切聯繫最密，並且在解脫農奴制度的舊有一切時，也是最緩慢，最困難的一種資本主義進化的保衛者。

既然民粹派分子並沒有把一八六一年的改革理想化，而熱烈真誠地擁護最少的支付和沒有任何限制的最大的『份地』以及農民在文化、法律及其他方面享有最大的獨立，所

以他們就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他們唯一的缺點，曾是他們的民主主義還遠不是經常很澈底和很堅定的，並且，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是他們所沒有理解的。在我們這裏，順便說說，甚至直到現在，最『左的』社會民粹派分子把上面那種結合語中的『資產階級』這個詞往往是了解成類似於…『政策』之類的什麼東西，而其實，資產階級民主這個名詞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是唯一正確的科學的定義。

民粹主義的這兩重傾向（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早在一八六一年改革的時代就已十分清楚地顯示了出來。我們不能在這裏詳細地來分析這些傾向，特別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第二種傾向的關係，而只能限於一般的指出政治思想派別上的差別，譬如說，卡維林和契爾內舍夫斯基間的差別。

如果一般地注意一下一八六一年俄國國家全部結構的改變，那就必然會承認，這種改變是在封建君主制度向資產階級君主制度轉變的道路上走了一步。這點不僅從經濟觀點來看是確實的，而且從政治觀點來看也是確實的。只要回憶一下法院、管理局、地方自治局等方面的改革的性質以及諸如一八六一年農民改革後所發生的各種改革的性質，就足以會相信這種論斷是正確的。可以對這『一步』走的是大是小，是快是慢展開爭論，但是，這一步走的方向却是這樣的明確和由後來所發生的全部事件說明得這樣清楚，以致對它未必能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現在越是可以經常聽到一種不加思考

的論斷，即是說彷彿俄國是在最近幾年來才在資產階級君主制度轉變的道路上『邁步』，那末，對這方向加以特別的說明就更有必要了。

上面所談及的民粹主義兩種傾向中的民主主義傾向，其所依據的自覺性和自動精神，不是地主集團，不是官吏集團，也不是資產階級集團的，這種民主主義傾向在一八六一年時是非常微弱的。因此，事情的發展只限於在轉向資產階級君主制度的道路上前進的最小的『一步』。但是，這種微弱的傾向已在那時就已存在了。它後來在改革後的整個時期內，無論是在社會思想範圍內也好，無論是在社會運動範圍內也好，都時而強烈時而微弱地表現了出來。這種傾向在這時代的每十年當中都在成長壯大，它是由國內經濟進化的每一步所滋養，因而也是由社會的、法律的、文化的條件的總和所滋養的。

農民改革四十四年以後，在一八六一年剛顯輪廓的兩種傾向，已在社會生活極其不同的活動範圍內，在社會運動的各種變動中，在廣大居民羣衆以及大的政黨的活動中有了極完全的和明顯的表現。立憲民主黨人² 和勞動派³ ——這兩個名詞是從最廣的意義上來了解的——是早在半世紀前就已顯輪廓的兩種傾向的直系の後輩、繼承者和直接的傳播者。一八六一年和四十四年後所發生的事件之間的關係，是無可懷疑的，顯而易見的。在半世紀的時間內，這兩種傾向的生存、鞏固、發展並成長壯大的這種情況，無可爭辯地證明了它們

的力量，證明了它們是根深蒂固地生長在整個俄國經濟結構中的。

新時代報的作家孟什科夫以下面這個別出心裁的冗句說明了農民改革和不久前所發生的事件的關係：『一八六一年的改革不能防止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因此，對於已遭到如此悲慘地失敗的改革，還叫什麼偉大呢？』（新時代報 4 第一二五一二號，一月十一日，『沒有必要的紀念日』）。

孟什科夫無意地以這句話觸及到了極其有趣的歷史科學問題，第一是關於改革和革命的一般相互關係，第二是關於一八六一年和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社會歷史思潮、意向、傾向間的聯系、依屬和緣起關係。

改革的概念，無疑是和革命的概念相對立的；忘記這個對立，忘記那個劃分兩種概念的分界線，經常就會在一切歷史問題的推斷上犯最嚴重的錯誤。但是，這個對立不是絕對的，這個分界線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活動的分界綫，要善於在每一個各別的具體場合中判斷這個分界綫。一八六一年的改革由於那些其利益要求改革的社會成分的極其軟弱、不覺悟、渙散，結果僅僅只是個改革而已。

因而，在這個改革中農奴制度的特徵會是這樣的濃厚，因而，其中官僚主義醜陋現象是這樣的嚴重，因而，它使農民所遭受的災難是這樣的難以計量。我們的農民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足所遭受的痛苦，遠比在資本主義中所遭受的痛苦為大。

但是，這個改革雖然因爲一定社會成分的軟弱無力，而只是個改革，但它却不管所有一切障礙和阻碍，而爲這些社會成分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這些條件擴大了舊的矛盾所依以爆發的基地，擴大了能夠自覺參加『爆發』這些矛盾的居民的集團、階層和階級的範圍。因此，結果是在一八六一年的改革中有意識和自由主義敵對的民主傾向的代表們，當時（並且在以後很長的時期內）好像是沒有基礎的孤獨者，而事實上却表現爲具有無限的『基礎』，——這是當那些在一八六一年幾乎呈萌芽狀態的矛盾成熟的時候。一八六一年改革的參加者是以改良主義者的觀點來看這次改革的，他們比起自由主義的改良者，却更有『基礎』。歷史將永遠把第一種人作爲時代的先進人物來追憶，而把第二種人看成是在陳舊衰亡的勢力前失去力量的，沒有氣節的和不澈底的人物。

民粹派分子從一八六一年起（而他們的前輩還要早些，即在一八六一年前），在其後五十餘年的時間中，一直以自己的理論宣傳，說俄國發展的道路是另一條道路，即非資本主義的道路。歷史完全駁斥了他們的這種錯誤。歷史充分地證明出，——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的事件，俄國社會各階級在這時期的發動，特別明顯地證實出，——俄國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的，並且它的發展不可能是別的道路。如果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半世紀的歷史中，直到現在還沒有了解到這些隱藏在錯誤思想體系中的爲祖國的發展實現『另一

條』道路的半世紀的意向的眞實意義，那這個馬克思主義者就很糟糕了。

把一八六一年和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加以比較，就很清楚地表明出，民粹主義者的思想體系的眞實歷史意義，就在於使兩條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對立起來：一條道路是使新的資本主義的俄國適應於舊的俄國，使前者隸屬於後者，延緩發展的進程，——另一條道路是使新的來代替舊的，完全消除阻碍新事物的舊的障礙，加速發展的進程。立憲民主黨人和勞動派的綱領，是自由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綱領——雖然這兩個綱領都是不澈底的，有時是混亂的和無意識的，——明顯地表現出了處於資本主義範圍內的，而在五十餘年一貫實現着的兩條眞實道路的這種發展。

現今的時代，特別迫切地要求我們清楚地瞭解這兩條道路發展的條件，要求我們對一八六一年兩種傾向以及對它們後來的發展，具有明確的概念。我們正在經歷着俄國國家整個結構的進一步的變動，即在向資產階級君主制度轉變的道路上再前進一步。這個新的一步，仍如過去一樣的沒有把握，一樣的動搖不定，一樣的不能令人滿意，一樣的沒有根基，它在我們面前提出了老問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兩條道路中，哪條道路將最後地確定俄國的資產階級結構，這點歷史還沒有作出決定，因為決定所依從的客觀力量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不能在經歷構成社會生活的全部磨擦、衝突、紛爭之前，就預先知道，這個決定將是什麼樣的。不能預先知道，

從一八六一年起就已存在的兩種傾向的合成力將是怎樣的。但是，可以——並且應當——達到對這兩種傾向具有明確的了解，達到使馬克思主義者們（因為他們是瓦解、渙散、信心不強、頌揚一時成就的混亂狀態中的『領導』，因此，這就是他們的任務之一）在這種合成力中起自己的作用，並且這種作用不是負的（如像取消主義和一切尾追各種頹廢情緒的無援的跛行那樣），而是正的作用，是保衛整個進化的利益，保衛整個進化的根本的和最重大的利益。

民主傾向的代表人物在走向自己的目的時，經常是動搖不定和陷入對自由主義的依賴的。反對這種動搖不定，消滅這種依賴，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最重要的歷史任務之一。

一九一一年二月刊載於思想報第三期。

署名：弗·依里因

『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

羅曼諾夫皇家老爺們的君主制度極為害怕的以及俄國自由主義者不勝感觸的紀念日，已經紀念過了。沙皇政府曾以加緊『在民間』出售『民族俱樂部』黑幫派的紀念小冊子，加緊逮捕一切『嫌疑分子』，禁止可能發表哪怕類似於民主主義的演說的集會，向報紙罰款並對其加以摧殘，迫害『謀叛』的電影院等來紀念這個紀念日。

自由主義者却是一再流淚哭訴必須要有『第二個二月十九日』(歐洲要聞⁵)，表示一下自己忠誠的心情(在言論報⁶最顯著的地方刊登沙皇的像)，說說自己公民的憂悶，祖國『憲法』的不可靠，斯托雷平土地政策所造成的『歷來土地原則的』悲慘的破壞』諸如此類等等來紀念這個紀念日。

尼古拉第二在給斯托雷平的詔書裏說，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即把農民的土地交給一小羣惡霸、富農、富裕農夫去任意掠奪，把農村交給農奴主去支配，恰恰就是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偉大改革』的完成。